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消解文化

——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英] 迈克·费瑟斯通 著 杨渝东 译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

丛书

社会学系列

宪 周晓

G0

16

消解文化

——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英] 迈克·费瑟斯通 著 杨渝东 译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6-09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英)迈克·费瑟斯通著;
杨渝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社会学系列)

ISBN 978-7-301-14798-6

I. 消… II. ①费…②杨… III. 文化—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8258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Mike Featherstone, 1995

书 名: 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著作责任者: [英]迈克·费瑟斯通 著 杨渝东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798-6/C·05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5.75印张 184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纪念我的母亲和父亲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

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 言

本书的各章完成于最近五六年当中。其中大多数文章有的一开始是会议论文,有的是为编论文集而写的。把它们从这一时期写的文章中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表达的主题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1a)一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扩展与深入。不过,它们并没有直接讨论表述后现代主义,而是力图从两个主要的关怀来探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第一个关怀是文化领域的形成与变形(deformation),它关系到文化自主化及在此过程中自主人物(英雄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类型等问题。第二个关怀是全球化的进程,在我看来,它能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诸多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知识背景。

我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工作能够坚持下来,得益于很多朋友与同事的支持,以及多次就这些问题与他们展开的讨论。我要特别感谢《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朋友:布莱切尔(Josef Bleicher)、博伊恩(Roy Boyne)、赫普沃斯(Mike Hepworth)、拉什(Scott Lash)、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B. 特纳(Bryan S. Turner),他们对本书所涉及的关注点非常熟悉。尤其是B. 特纳、拉什和罗伯逊,他们早已以自己独到的方式越过了我正试图穿过的这个地界(值得专门一提的是罗伯逊在全球化理论中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我还想感谢赫普沃斯和伯罗斯(Roger Burrows),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提了很多有用的出版意见,并说服我忍痛接受编辑行

当信奉的格言：删得越多，文章越好。另外，我必须向提兹塞德大学（University of Teesside）人文研究学院的社会学、犯罪学及社会政策课题组的同事们给予我的支持表示谢意，我任性的探索得到了他们的鼓励与宽容。成人生活研究中心中我新近的那些同事，尤其是邦顿（Robin Bunton）和伯罗斯对我帮助尤其之大，他们和 B. 特纳与我一起开办了《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副刊《身体与社会》。我也非常感谢考克斯（Barbara Cox），迄今她已在《理论、文化和社会》工作多年，并找到了将我们后现代风格的作品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次序进行编排的办法，使得我们都能在出版的最后期限前如约付稿。在《理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这岁年中，巴尔（Stephen Barr）、伊斯门特（Ian Eastment）、多马切维奇（Krysia Domaszewicz）、希尔（David Hill）、马科夫（Jane Makoff）、罗杰克（Robert Rojek）、沃克尔（Janey Walker）等圣贤出版集团（Sage Publications）的朋友在各种计划中都给予了我们鼓励与帮助：对他们的耐心与支持，我在此忱致谢意。

在最近几年当中，我有幸到巴西、日本、加拿大出任访问教授，享受了一种游历式的学术生活。我得感谢圣保罗坎皮纳斯大学（Campinas University）、京都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同事和学生，他们使我在各地的生活变得既温馨而又颇有收益。对这三个国家中以上单位和其他机构给予过我支持，以及就本书展开论述的很多观点与我交换过意见的人，我想应该在此提到他们的名字：阿兰特斯（Antonio A. Arantes）、巴斯特（Ana Zahira Bassit）、德伯特（Guita Debert）、德斯古拉（Arnaldo Augusto de Siguera）、塔斯纳（Gisela Taschner）、森川牧夫（Makio Morikawa）、青木康弘（Yasuhiro Aoki）、原田胜（Katsu Harada）、川崎健一（Ken'ichi Kawasaki）、金（Chris King）、北川丰家（Toyoe Kitagawa）、玛尔（John Maher）、中野秀一郎

(Hideichiro Nakano)、小川洋子(Yoko Ogawa)、奥田一彦(Kazuhiko Okuda)、萨伯·表(Sab Omote)、和田秋一(Shuichi Wada)、弗勒(Sharon Fuller)、格鲁诺(Rick Gruneau)、克莱恩(Stephen Kline)、拉巴(Martin Laba)、雷伊(David Ley)、皮内特(Richard Pinet)、牛顿(Carolin Newton)。

我还想感谢在我形成本书的很多观点中,从不同方面予以我帮助的朋友和同事:鲍曼(Zygmunt Bauman)、博文(Laura Bovone)、卡内瓦西(Massimo Canevacci)、钱尼(David Chaney)、埃德(Klaus Eder)、弗里斯比(David Frisby)、埃皮奈(Christian Lalive d'Epinay)、门内尔(Stephen Mennell)、牟伦(Brian Moeran)、墨玛斯(Hans Mommaas)、欧康纳(Justin O'Connor)、奥尼尔(John O'Neill)、帕纳乔内(Oswaldo Panaccione)、罗比拉德(Britt Robillard)、雷克斯(John Rex)、罗杰克(Chris Rojek)、斯温格(Hermann Schwengel)、斯科夫(Lisa Skov)、威姆斯特(Sam Whimster)、华特士(Cas Wouters)、德雷克(Derek)与韦恩(Jenny Wynne)。我还必须感谢曾经给予过我帮助和鼓励,但现在已不幸离我而去的朋友: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哈佛卡普(Hans Haferkamp)和滕布鲁克(Friedrich Tenbruck)。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埃达娜(Edna)、克拉芮(Claire)和约翰(John),他们理解和宽容了我在楼上房间从事个人自己的工作。

目 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文化复杂性的全球化	(1)
消解文化的整体性	(1)
全球的现代性与文化的复杂性	(8)
第二章 文化领域的自主化	(21)
商品化消费的生产	(23)
象征产品与社会秩序	(28)
浪漫主义、欲望与中产阶级消费	(33)
结语:文化领域的发展	(39)
第三章 人格、统一性与有序的生活	(47)
人格与生活秩序	(49)
伦理学与美学	(52)
后现代主义	(61)
结 语	(68)
第四章 英雄生活与日常生活	(75)
日常生活	(76)
英雄生活	(82)
英雄伦理、特立性与文化领域	(87)
女性、消费文化和对英雄生活的批评	(92)

第五章 后现代的全球化	(101)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	(105)
对后现代的解释	(109)
全球化与后现代理论	(111)
全球化与后现代	(113)
第六章 全球化与地方文化	(119)
文化的全球化	(120)
地方文化	(127)
结 语	(134)
第七章 地方主义、全球主义与文化认同	(141)
地方主义与象征共同体	(143)
作为共同体的民族	(151)
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159)
结 语	(171)
第八章 旅行、迁徙与社会生活的想象	(175)
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固定形象	(179)
文化整合与植根 (rootedness)	(189)
全球的现代性	(201)
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导论：文化复杂性的全球化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

(W. B. 叶芝：《第二次降临》)

那些写作的人，旅行去吧。

别处的艺术，就是去那儿。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消解文化的整体性

叶芝(Yeats)的这句诗屡屡被用来直接和间接地凸显当下文化的破碎与错位感。在这种感觉里，文化已失去了中心，没有了连贯性与整体性；它再也不能为构建或规定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一个适当的解释。这句诗的前两句，亦即该诗的开篇是这样的：“盘旋又盘旋在渐渐广阔的锥体中，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声音。”这种找不到回归路、迷失了连贯与秩序之起点的无力感，无疑在一战结束及旋后的很多事件中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而叶芝的诗就正好写于这段时间。

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化破碎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早蕴涵在

一些书名当中,比如《远离中心》(*Off Center*) (Miyoshi, 1991)、《失落的男子性》(*Dislocating Masculinity*) (Cornwall 与 Lindisfarne, 1994)、《文化研究的重新定位》(*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 (Blundell 等, 1993)、《边界的对话》(*Border Dialogues*) (Chambers, 1990)、《不安的边界》(*Distupted Borders*) (Gupta, 1993)、《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hatterjee, 1993)、《去中心化的闲暇》(*Decentring Leisure*) (Rojek, 1995)。实际上,恰如在这张增长飞快的清单上可添入的本书书名所示,迄今人们一直都还在“消解文化(undoing cul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晚期的文化分析家们却很少有人试图去考查那些与今天具有潜在相似性的历史时期,譬如叶芝写《第二次降临》时这段一战之后不久的时期——在斯宾格勒(Spengler)、舍勒(Scheler)、韦伯(Weber)及其他学者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危机感。假如扯得更远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曾让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977)和其他人(Buci Gluckmann, 1994; Maravall, 1986)着迷的 17 世纪巴洛克文化。不过,若拿阿多诺(Adorno)的语汇“无记忆的人”(或许今天我们该说人民了)来调侃一下,我们也不能被谴责为孳生出这种人的第一代。

可以说,这种存在着文化危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时代下一个诊断”的感觉,长期以来一直为文化专业者(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间人)所频频提及。其实,他们对解开和重系文化的结点持有一种职业的兴趣。这并不是说文化专业者在刚愎自用或反复无常地制造着文化危机。他们所做的,明显是在处置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与想象。然而,我们需要研究的,恰是他们直接置身的世界,亦即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学术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条件与“别处”更大世界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就是,战后时代的学术实践已经发生了特殊的转变,那些有能力垄断

学术产品的供给并受严格控制的机构,已经被一个去垄断化的时代所取代,这给外部群体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机会。

我曾在前一本书《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不应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一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相反,我们应关注那些文化专业者、文化中间人以及各式各样新文化产品迅速膨胀的受众(在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代人)的行为,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与文化的不同中间状态。跟宣称文化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社会已经终结的那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支相反,在该书中我指出我们还无法成竹在胸地进入社会生活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它彻底打破了将不同的人类群体束缚在一起的权力平衡与相互依赖。但同时必须要承认的是,诸如“社会的”和“社会”等概念已不再能够兑现它们曾经期许的理论价值。本书较后的几章将讨论到,对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来说,其所谓的团结性和整体性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下逐渐瓦解。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之所以我们会这样设想,乃是因为“社会”这个概念长期被视为我们构想社会生活应为怎样的现实时投射的影像。它遮盖了很多从未被驯化、约束和整合的社会进程。其中,旅行和流动对建构社会生活之形象的不同作用,将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探究这样一些所谓已将文化从社会分离出来了的进程,以及这个特殊的形象本身是如何形成的一些途径。可以说,已经有观点认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化的(比如 Baudrillard, 1993)。事实上,文化现在已经超越了社会,并从后者在经济生活、性别、族群、地域等等方面的传统决定论中摆脱了出来。如果我们来考虑文化去中心化(decentring of culture)这个概念,可把它看做一个反论:文化其实并没有被去中心化,相反,它是被再中心化(recentred)

了。如果我们想一下学术生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正在显著增长,那么此言就果真不虚。长期处于社会科学领域边缘的文化,如今已经被移至中心。举个例子吧: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那本《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Featherstone, 1991a)得到了《不列颠产业关系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的评论。而在70年代,这样一本关于文化与理论的书想要得到一本产业关系杂志的评论,简直是一种奢望。很多曾在80年代早期的《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及其他刊物上讨论的理论与文化问题,今天也登上了商务、管理和组织研究等领域新创的杂志。可以说,这种变化属于学术生活更广泛的变化趋势,通过更积极地支持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的边界正在逐渐弱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更为一般性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其实是有学术生活的内部的文化再中心化与之形影相随。

因此,对形成我们这种或统一或破碎的文化感的学术内外的进程,以及更广阔领域中的文化生产者进行考察,就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文化的生产者,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实践,不仅是在对前人留予我们、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文化库进行再生产,而且当它沿着更替不断的代际链这个人类生活重要构成要素传递时,我们也是在对其加以改造和形塑。不过,我们整体参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程度,由于历史阶段和社会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样,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也是如此,差不多每一个社会 and 每一个社会实体都存在着自己从事生产与传播文化的专业群体(传教士、艺术家、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教师、学者、文化中间人等等)。当然,这些群体通过生产和调动文化的能力而获得的权力并不是畅通无阻的,这本身要取决于他们与那些通常来说要更为强大的群体,譬如经济与军事专业人士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力量平衡。因此,我们关于一种文化的价值、意

义、潜在的统一性或者充满危机的品性的整体感觉,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那些文化生产从业者的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文化从业群体的权力可能会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使得某些特殊的文化形式获得显著的自主性和声望。在第二章我将关注这个问题,探讨那些导致文化领域得以形成和自主化的进程。自 18 世纪以来,相对独立的文化领域随公共领域(Habermas,1989)的形成而得到发展,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声望亦一路相随向上攀升,并且达到了对某些中产阶级群体来说艺术成为了一种英雄的生活方式,而且它比生活本身还要更为重要的程度。

这成为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关注的主题,这两章将讨论在导致文化领域自主化的进程中,这种严谨的英雄生活是怎样被塑造造成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斯·韦伯对清教徒严格恪守的生活所产生一致感的尊崇,我们都非常熟悉,同时他也认为在现代这种社会这种感觉不可能得到再生产。在他看来,艺术、知识或者性生活必然都不是完整的,缺乏根本的一致性,这已成为现代性中个人命运的某种表现。不过,如果我们把那些关于韦伯个人生活的阐述考虑进来,它们都试图把他的生活描绘成英雄式的禁欲苦行,甚或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可行而“高贵”的方式,以应对生活的理性化造成的无意义感和因现代世界各种不相容的价值观彼此冲撞而产生的混乱感,这个话题就出现了一丝有趣的偏差。我们不得不把这种男性化的英雄自我塑造方式所要求的牺牲与隔绝,放到与达致一种严谨的生活相反的可能性上。在后一章当中,我就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的世界、继续生计与女人都与男性化的英雄式理想构成了反差。然而,这一曾在 19 世纪晚期的艺术与知识生活中鼎立一时的理想,已经随着文化领域的变形和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渐江河日下了。我们不应只是将此视作一

种悲剧性的丧失,还应看到它使得原先遭到排斥的群体发展出了新的认同方式。

所以有人认为,在 20 世纪,文化领域的形成与自主化进程已让位于变形了。与 20 世纪晚期的后现代主义相联的一派观点就认为,我们正在见证“艺术的终结”,艺术家作为英雄人物的结束引出的就是雕刻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的蔓延,尤其是批量生产与商品符号和影像的泛滥,宣告了一个孤立的文化领域的终结。

这里,可再用叶芝的《第二次降临》这首诗来说明这个过程。这首诗通常虽然被当做高雅文化的专业经典在中学和大学里教授,最近它却被面向公众包装起来,变得非常流行。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 新近录制了一张 CD,其中有首歌就用了这首诗作歌词。也许叶芝会赞同把他的诗这样流行化,以便让它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此就显得不再适宜。琼尼·米歇尔为居间的听众写歌,他们不能简单地归为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属于高雅文化。可以说,这是一个“跨越边界”的例子,先前封闭的文化形式轻易地穿过了曾一度守护严密的界线,产生出不同寻常的关联与融合。

这种对跨越边界的文化进行概念化所面临的困难,是第五、六、七章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消费文化中,文化商品与影像的流动强度越来越大,使得阅读文化变得更加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在文化符号或影像与它的使用者或消费者之间落实一种固定的意义和关系。如我在第二章将指出的那样,关于文化领

* 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1943 年生,加拿大著名创作女歌手,早期从事民谣摇滚创作,大胆尝试各种风格的音乐,结合乡村、爵士、前卫等多元乐风,之后又转向传统的摇滚音乐,成为最有创意的一位歌手。——译注